

上海市近年人口发展状况分析*

郭志刚 李 丁

【摘要】上海市无论在人口转变还是在社会经济发展方面都处于全国领先地位,因此作者认为通过对上海市当前人口发展状况的分析可以反映其未来趋势,而且对全国未来人口前景也有重要启示。由于上海长期持续极低生育率,当前户籍人口年龄结构畸形脆弱,依赖大量吸纳年轻外来劳动力支撑社会经济运行。这种人口状况促使上海青年择偶圈突破了户籍限制,并突显出常住外来人口的户籍与社会保障问题。然而,上海及全国城市的这种人口城市化发展模式是不可持续的,导致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比城市更为严重。文章指出,在全国总体低生育水平下,各出生队列的规模相继缩减,因此,需要对以往人口城镇化模式加以反思和探讨。

【关键词】人口变动 人口结构 人口城镇化 可持续性

【作者】郭志刚 北京大学中国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社会学系教授;
李 丁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

上海市是全国生育率下降最早、目前生育率最低的地区,户籍人口连续保持了十几年的负增长,生育水平已降至“极限中的极限”^①。2009年上海户籍人口中60岁以上老年人口比例为21.61%,人口老龄化水平已比全国高1倍,接近日本、瑞典等世界人口老龄化最高的国家^②。可是与此同时,从上海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上却看到近年上海市常住人口一直保持着正的自然增长率。上海市的人口问题引发了大量关于可持续发展和人口安全方面的研究与讨论(彭希哲,2008;王桂新,2008)。本研究所关注的问题是,像上海市这样的生育率极低、户籍人口数量不断缩减、人口老龄化最严重的地区是如何保证社会经济正常运行所需的必要人口条件的呢?上海市的经验能否为全国应对未来严重的人口老龄化问题提供借鉴和参考呢?

* 本研究为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人口发展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项目批准号:08ARK001)的阶段成果。

① 《上海连续15年户籍人口负增长 生育水平降至极限》,《解放日报》,2008年12月21日。

② 《上海老龄化程度比全国高一倍》,《青年报》,2009年7月23日。

一、不同口径的上海市人口自然变动统计

改革开放以前,中国人口的迁移流动情况很少,常住人口基本上与户籍人口没有太大差别,所以政府部门公布的人口自然变动统计往往都是以户籍人口作为统计口径,也就是说其中不含外来人口的影响。然而,随着迁移流动情况越来越多,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之间的差别越来越大,政府公布的人口统计中也就随之增加了常住人口的统计口径。常住人口口径的统计更适用于社会经济规划,然而常住人口中既包含了原来就居住此的户籍人口,也包含了在本地已经居住较长时间的外来人口。为了回答上面提出的研究任务,我们就必须取得上海市不同口径的人口统计数据来加以分析。

前面引用的上海市人口状况的报道均采用户籍人口口径,因为从这个角度反映出来的低生育率、人口老龄化和人口负增长方面的情况更为严重。当采用常住人口口径时,由于外来常住人口的纳入,实际上对这些问题都会有所缓解。不过,这些问题的缓解主要表现在宏观层面,如果从家庭和代际关系角度来看,就会展示出十分不同的特点,外来常住人口的纳入并不能解决这种微观层面的问题。下面根据能够收集到的上海市人口的统计数据信息,就此问题做一个初步的分析。

(一) 上海市户籍人口的自然变动统计

本文所用不同来源的户籍人口自然变动统计均引自上海市公安局。将各数据来源汇总在一起,得到上海市户籍人口历年自然变动的统计资料(见表1)。

从表1可以看出,上海市户籍人口进入负增长始于1993年。2003年出生人数及出生率均为迄今最低历史水平,而该年死亡水平又略高一些,因而人口自然增长达到迄今最大负值(-3.24‰)。上海市2003年这种低出生是与全国统计对应的,因为该年正好是民俗认为属相不好的“羊年”。2004年出生则出现明显堆积,显然有对前一年补偿生育的因素。2005年出生水平又略有增加,而2007年出生人数和出生率又出现更为明显的提高,2007年出生率比2006年高出1.39个百分点来,相应的变化率则为1.23倍,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可能与新闻媒体炒作的“金猪”年和育龄妇女结构有关。尽管如此,2007年的户籍人口自然增长率仍为负值(-0.10‰)。虽然近年来上海市户籍人口出生率存在一些波动,但由于人口不断老龄化,其死亡率也有明显波动和提升的趋势,其结果导致户籍人口的自然增长率一直为负值。特别是近两年,户籍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又返回了负向走低趋势。

(二) 上海市常住人口的自然变动统计

上海市人口计生委网站提供了近年更多口径的人口自然变动统计资料(见表2),使我们有可能根据这些信息做进一步的简要分析。

上海市人口计生委公布的近年常住人口自然变动统计显示出其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都显著高于户籍人口(约1.3倍),而其死亡率则显著低于户籍人口(只相当于其80%)。因此,虽然户籍人口持续负增长,但近年按常住人口口径统计却保持在3‰左右的自然增长率。根

据表 1 提供的
数据可以推算
出,2006 年上
海市外来常住
人口已占全部
常住人口的
25.7%,近年这
一比例还在继
续提高,2009 年
已达到 28.2%。
外来常住人口
的数量和所占
比例对上海市
人口发展有重
大影响。

表 2 中的
户籍人口与户
籍常住人口相
差的只是户籍
外出人口,其
数量很少,对
于推算户籍常
住人口的统计
影响很小,即
使忽略不计,
所推算的户籍
常住人口统计

结果与公布的户籍人口统计也没有明显差别,因此可以简单地用外来常住人口的结果直接与户籍人口的自然变动统计加以比较。上海市“外来常住”人口的出生率几乎是户籍人口的 2 倍,而其死亡率则不到户籍人口的 1/4。于是,“外来常住”人口便具有了很高的自然增长率,2006 年为 10.1%,2009 年又进一步提高到 12.4%。因此,上海市越来越多的外来常住人口在出生率、死亡率和自然增长率上的突出特征较大地影响了上海市的人口统计结果。近年来上海市常住人口的正增长率实际上是由于上海所吸纳的外来人口及其自身较高的自然增长率导致的。

表 1 上海市户籍人口自然变动统计

年份	出生		死亡		自然增长	
	人数(万人)	出生率(‰)	人数(万人)	死亡率(‰)	人数(万人)	自然增长率(‰)
1978	12.36	11.3	6.82	6.2	5.54	5.1
1980	14.31	12.6	7.39	6.5	6.92	6.1
1985	15.43	12.7	8.10	6.7	7.33	6.0
1986	17.75	14.5	7.93	6.5	9.81	8.0
1987	19.02	15.3	8.27	6.7	10.75	8.6
1988	16.53	13.2	8.47	6.8	8.06	6.4
1989	15.91	12.5	8.43	6.6	7.48	5.9
1990	13.12	10.2	8.63	6.7	4.49	3.5
1991	10.08	7.8	8.56	6.7	1.52	1.1
1992	9.37	7.3	9.10	7.1	0.27	0.2
1993	8.40	6.5	9.40	7.3	-1.00	-0.8
1994	7.63	5.9	9.42	7.3	-1.79	-1.4
1995	7.11	5.5	9.79	7.5	-2.68	-2.0
1996	6.79	5.2	9.77	7.5	-2.98	-2.3
1997	6.42	4.9	9.57	7.3	-3.15	-2.4
1998	6.17	4.7	10.13	7.8	-3.96	-3.1
1999	6.56	5.0	9.54	7.3	-2.98	-2.3
2000	6.95	5.27	9.45	7.17	-2.50	-1.90
2001	5.76	4.34	9.34	7.05	-3.58	-2.71
2002	6.20	4.66	9.67	7.27	-3.47	-2.61
2003	5.73	4.28	10.07	7.52	-4.34	-3.24
2004	8.09	6.00	9.65	7.16	-1.56	-1.16
2005	8.25	6.08	10.23	7.54	-1.98	-1.46
2006	8.12	5.95	9.80	7.19	-1.68	-1.24
2007	10.08	7.34	10.22	7.44	-0.14	-0.10
2008	9.67	6.98	10.70	7.73	-1.03	-0.75
2009	9.23	6.62	10.67	7.64	-1.44	-1.02

注:1978~1994 年数据引自上海市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网站(<http://www.spic.sh.cn>);
1995~2009 年数据引自《上海统计年鉴(2010)》。

二、上海市近年各类人口的出生孩次分布情况

虽然上海市外来常住人口的出生率是户籍人口出生率的2倍,但并不意味着上海户籍人口每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而外来常住人口每对夫妇平均要生两个孩子。因为人口出生率并不是生育测量指标,其中包含着人口结构的很大影响。上海市户籍人口老龄化程度已经很高,而外来人口则往往多为青壮年,这同时意味着外来女性人口中大多正处于生育旺盛期。此外,这些外来妇女虽然在上海常住,但在计划生育方面却遵守户口所在地的生育政策规定。

表3中提供了各类人口口径出生人口的孩次分布^①。从中可以看出,近年上海市户籍出生人口的一孩比例均保持在95%左右,反映出户籍人口出生比较严格地遵守了独生子女政策规定。近年上海市常住人口的一孩率保持在80%左右,显著低于户籍人口,其原因是外来常住人口的一孩率(59%左右)较低,二孩率(39%左右)和多孩率(不到2%)较户籍人口高。但从这样的出生孩次分布来看,上海外来常住人口平均生育子女数也远低于2个。

表2 2006~2009年上海市不同口径的人口自然变动统计

年份	统计口径	年末人口(万人)	出生率(‰)	死亡率(‰)	自然增长率(‰)
2006	常住人口	1815.1	7.47	5.89	1.58
	户籍常住	1348.1	6.0	7.3	-1.3
	外来常住	467.0	11.76	1.71	10.05
2007	户籍人口	1368.1	5.95	7.19	-1.24
	常住人口	1858.1	9.07	6.03	3.04
	户籍常住	1358.9	7.4	7.5	-0.1
2008	外来常住	499.2	13.63	1.76	11.87
	户籍人口	1378.9	7.34	7.44	-0.10
	常住人口	1888.5	8.89	6.17	2.72
2009	户籍常住	1371.0	7.1	7.8	-0.8
	外来常住	517.4	13.75	1.67	12.08
	户籍人口	1391.0	6.98	7.73	-0.75
2009	常住人口	1921.3	8.64	5.94	2.70
	户籍常住	1379.4	6.7	7.7	-1.0
	外来常住	541.9	13.65	1.23	12.42
	户籍人口	1400.7	6.62	7.64	-1.02

注:户籍常住人口的统计根据常住人口与外来常住人口的统计数推算估计。由于户籍外出口数量很少而影响不大,因此在推算中忽略不计。

资料来源:上海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官方网站(<http://www.popinfo.gov.cn/stat/ssh>)。

近年上海市户籍人口出生率有一次明显上升,即从2006年的5.95‰上升到2007年的7.34‰。从表3相应年份的户籍人口出生孩次比例来看,2007年户籍人口的一孩比例比2006年有所提高,而二孩比例和多孩比例有所下降。可见2007年上海市户籍人口出生率的提高并不是由于计划生育管理上出了问题,而是由于“金猪年”生育偏好或时期育龄妇女堆

① 原数据来源虽然名为某年“生育分析”,其实只是对出生本身的分析,而不是与育龄妇女状况(比如年龄特征)相联系的生育分析。

积等其他原因造成的。

从表4上海市各年份的准予登记结婚数和初婚人数统计资料来看,上海市有两次结婚高峰,一是1980~1985年,二是2006年。这两个高峰之间正好是一代人的间隔。因此,近年出生率和人口增长率的提高与年龄结构因素有关,即初婚高峰引发了出生量的增加。

近年上海市人口计生委开始重视“婚嫁女性”的出生情况。她们是户籍不在上海的外来新娘,在以前统计中曾被称为“母亲非本市户籍人口”。由于上海吸引了大量流动人口,于是产生了这样一种新情况,实际上这也是全国其他城市的人口发展趋势。

根据东方网上的资料,近年来上海市“两地婚姻”数量呈大幅增加的态势。另据2005年8月上海市政协十届四十四次主席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上海两地

婚姻状况的分析及对策建议》透露,2004年“两地婚姻”已占全市婚姻登记总数的1/3。据解放网上公布的2007年3月20日《新闻晨报》刊登的“上海首份结婚新人调查报告”显示,一

表3 2007~2009年上海市人口出生情况的孩次分布

年份	统计口径	出生总数	一孩率(%)	二孩率(%)	多孩率(%)
2006	常住人口	134201	80.05	18.37	0.58
	外来常住人口	53205	58.77	39.89	1.35
	母亲非本市户籍人口	14890	95.92	4.01	0.07
	非常住户籍人口	190	91.05	8.42	0.53
	户籍人口	81186	95.69	4.24	0.07
2007	常住人口	166600	80.89	18.41	0.7
	外来常住人口	65838	58.13	40.18	1.69
	母亲非本市户籍人口	16931	96.24	3.71	0.05
	非常住户籍人口	247	92.31	7.69	0
	户籍人口	100762	95.76	4.18	0.06
2008	常住人口	166640	80.39	18.76	0.85
	外来常住人口	69926	59.15	38.92	1.93
	婚嫁女性	15462	96.36	3.58	0.06
	户籍流出口	192	93.75	6.25	0
	户籍人口	96714	95.75	4.18	0.06
2009	常住人口	164600	79.52	19.8	0.68
	外来常住人口	72261	59.81	38.72	1.47
	婚嫁女性	14260	96.21	3.75	0.04
	户籍流出口	185	92.43	5.95	1.62
	户籍人口	92339	94.95	4.99	0.06

注:(1)常住人口出生中含户籍流出口出生。(2)婚嫁女性出生数为当年婚嫁妇女实际生育数。

资料来源:同表2。

表4 上海市部分年份婚姻情况

年份	准予登记结婚 (万对)	初婚 (万人)	年份	准予登记结婚 (万对)	初婚 (万人)
1980	16.82	33.07	2001	9.30	15.23
1985	18.24	35.47	2002	9.10	14.60
1990	10.77	19.49	2003	10.82	17.20
1995	8.40	14.61	2004	12.49	20.27
1996	8.96	14.98	2005	10.27	16.44
1997	8.84	15.12	2006	16.56	27.29
1998	8.57	14.48	2007	12.01	18.10
1999	9.05	15.07	2008	14.16	22.04
2000	9.31	15.08	2009	14.99	23.33

资料来源:《上海统计年鉴(2010)》。

方户口在上海,另一方户口在外地的夫妇数量快速上升。2006年,异地联姻的新人有55 992对,比2005年增长了55.96%。2004年“两地婚姻”的新人为39 734对,2003年两地婚姻为30 895对,2002年为25 628对,而1990~1995年“两地婚姻”年平均数仅5 000对。上海人“两地婚姻”的增加,婚姻观念的迅速转变,引发了对外来媳妇及其子女的户口政策的探讨(周海旺,2001;赵丽丽,2008)。2003年上海市出台了外来新娘在上海生活若干年后便可取得上海户口的规定,2009年的“上海户籍新政”也与此有关。实际上,这种两地婚姻数量增长的现象并不只是上海专有,在全国其他流动人口多的地区(如北京、天津、广东、江苏、浙江等)也有显著增长(周皓、李丁,2009)。

表3数据显示,“母亲非本市户籍人口”和“婚嫁女性”的一孩率高达96%,略高于户籍人口。实际上,从其他方面的资料来看^①,近年外来常住人口的综合避孕率也最高,常住人口其次,户籍人口最低。并且,这3种口径的综合避孕率近年都有所下降。当然,综合避孕率并不是越高越好,但这个指标可以反映育龄妇女是否准备近期生育,而近年来上海市户籍人口综合避孕率的下降是与大量年轻人口进入婚育高峰期紧密联系的。

三、上海市2005年常住人口的年龄结构

上海常住人口近年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变化受人口结构影响很大,其中既包括户籍常住人口本身年龄结构的影响,也包括外来常住人口年龄特点的影响。图1提供了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的数据样本汇总的上海市常住人口的人口年龄“金字塔”,其中还包含是否为上海市户籍的分类。这一数据样本约相当于全国人口的2‰抽样。尽管这个样本未必有很好的代表性,但也可以反映外来人口对上海人口发展的重大影响。

从图1可以看出,2005年上海50岁以上人口部分还具有“金字塔”形状,并且各年龄组中虽然也含有外来常住人口,但所占比例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18~49岁这一青壮年劳动年龄段人口构成了上海人口年龄结构中非常粗壮的部分,其中各年龄组人口虽参差不齐,却大体维持在相近的人口规模上。并且各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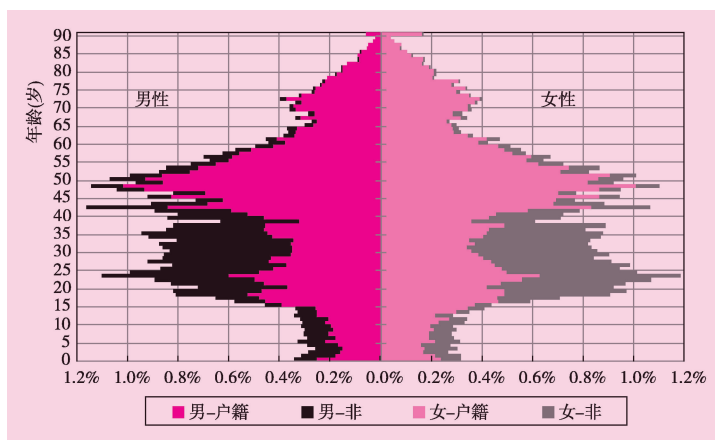


图1 上海市2005年常住人口“金字塔”

注:根据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的再抽样原始数据计算。

^①上海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官方网站(<http://www.popinfo.gov.cn/stat/ssh>),已婚育龄妇女落实避孕措施情况。

龄组中的男女两性人口中外来常住人口均约占一半。也就是说,外来常住人口实际上已经承担着支撑上海社会经济发展的“半壁江山”,这实际上反映出维持上海社会经济的发展的劳动力刚性需求。这个年龄段同时也是育龄阶段,所以外来常住人口构成了上海市人口再生产的另一重要支柱。

与青壮年劳动年龄人口的年龄组规模相比,上海的0~17岁未成年人口各年龄组的规模呈现出巨大的凹陷。在这一低龄段中,外来常住人口占30%以上。尽管所用样本数据并未提供信息来反映这些非上海户籍的未成年人口是否在上海出生,但从图1的户籍人口部分可以清楚地看到,50年前(即20世纪50年代后期)上海人口的生育率就已经开始显著下降,之后的计划生育及其独生子女政策的推行更导致0~40岁年龄段人口规模被强力镌刻,使这两代人的规模都相对其父母一代人数几乎打了对折。看到上海的生育率之低、延续时间之长给上海的人口再生产造成的影响,才能真正理解“上海生育水平已降至极限的极限”,因为从人口结构上已经充分反映出长期延续极低生育水平没有可持续性。首先,可以看出改革开放以来原有上海户籍人口的劳动力规模已经远远不能满足上海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因此才吸纳了如此多的外来人口。其次,上海2005年时的0~15岁少儿人口从现在起陆续进入劳动力市场,显然其人口规模更小,更不能应对上海社会经济平衡发展,这就需要继续吸纳更多的外来人口。第三,上海市户籍人口老龄化程度已接近日本、瑞典等国家的水平,然而从图1可以看出,更大规模的年龄组将在今后15~20年内陆续进入老龄阶段,而作为劳动力后备军的少儿人口则严重不足,即使像过去30年那样靠吸纳外来人口加以补充,也不能改变未来上海人口老龄化将更为迅速的趋势。况且,吸纳外来人口主要是解决宏观社会经济运行条件问题,很难对微观家庭层面问题施以援手。第四,上海现在已经吸纳的外来劳动力对支持上海社会经济发展和养老保障的作用非常大,但未来他们终将会进入老龄,上海市是否愿意采取某种方式拆除外来人口与户籍人口之间的“藩篱”,给予同等对待,不仅对稳定外来人口的“军心”、而且对今后吸纳更多外来人口有重要的示范作用。在这一方面,2009年“上海户籍新政”正在尝试新探索,但户籍准入口子开得十分谨慎,显然不能满足绝大多数常住外来人口的需求。

前面提到,上海“异地(户籍)婚姻”增加和人们择偶观念的改变正在得到社会的关注。从上海市人口婚姻市场的角度来看,图1提供的信息使我们能更容易理解上海这一变化的特定人口背景。从图1中可以看到,上海处于20~40岁的结婚高峰期各年龄组中的外来人口数量巨大,有些年龄组外来人口数甚至超过了户籍人口数。因此,当一个上海户籍的青年择偶时,其适龄异性中有一半都是外来人口,这种人口状况无疑会影响他们的选择。无论对于男青年还是女青年,都面临同样的处境。事实上,在上海新结婚的夫妇中,不仅外来媳妇、本地郎已经很多,而且本地媳妇、外来郎也并不少见。结合上海未来人口发展趋势来看,这样的情况还会越来越多。

四、上海市人口发展的启示

上海市无论在人口转变方面还是在社会经济发展方面都率全国之先,因此,其当前的人口特点和所面对的人口问题对其他城市乃至全国都有重要启示。上面利用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样本具体地分析了上海外来人口的重要影响,其实类似情况在全国其他大城市乃至城镇都不同程度存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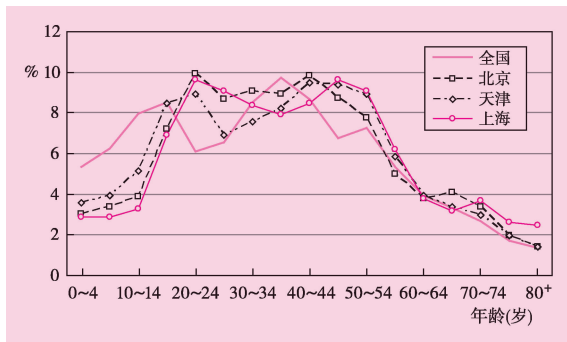


图2 2005年京、津、沪与全国人口年龄结构的比较

资料来源: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公布数据。

图2为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公布数据中京、津、沪的人口结构曲线与全国情况的比较。尽管近年全国人口调查在青壮年劳动年龄段和少儿年龄段都存在一定人口漏报,但仍然能反映出京、津、沪三大都市都明显得益于外来人口解决了劳动力不足并缓解了人口老龄化程度。图2中可以看出,全国人口年龄结构比例在20~29岁年龄段显著下凹,如果京、津、沪人口仅按生育和死亡进行自然人口变化,

那么这个年龄段人口比例应该比全国下凹得更甚^①。但是,在实际人口的该段比例上,北京和上海不仅没有出现下凹,反而有所凸起。天津市的20~24岁人口比例远远高于全国水平。可见,当前京、津、沪依据其社会经济优势吸纳其他城镇和广大农村的年轻劳动力,才保证了社会经济发展运行的必要人口条件。

京、津、沪的人口状况告诉我们,全国各大城市乃至全国城镇也存在类似的吸纳外来劳动力的情况,这是一种梯次化的普遍人口现象。人口城镇化水平的提高是现代化的表现,但同时也带来一些新的问题,如导致中国人口老龄化由农村领先(杜鹃,1994;王涤、顾宝昌,2005)。早在1990年,这种吸纳过程就已经使农村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8.73%)高于城镇(8.15%);2000年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已超过城镇1.2个百分点,2005年城乡之间的这一差距又扩大到1.6个百分点(见表5)。

表5的统计表明,农村虽然出生水平显著高于城镇,但其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却远低于城镇,其中原因主要是城镇有选择地吸纳了农村青壮年劳动力。从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公布数据绘制的城乡人口结构“金字塔”来看(见图3),城镇人口在20~49岁的比例要显著高于农村。由于流动迁移的这种年龄选择性,留守农村的老年人口和少儿人口形成了相对的“两头沉”。所以,从人口结构角度看,在全国迅速人口老龄化进程中城乡却表现出极为不同的情况。城镇通过吸纳农村年轻劳动力解决了宏观社会经济运行所需的劳动

① 从代际生育角度来看,京、津、沪这个年龄段人口比例会因为其父母一代人数较多而产生人口“回声”,也会自然有所增加,但考虑到这三大都市30年来严格实行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因而这种增长量并不会很大。

表 5 全国及分城乡常住人口的年龄结构变化

%

年龄组 (岁)	1990年			2000年			2005年		
	全国	市镇	县	全国	市镇	县	全国	市镇	县
0~14	27.69	22.33	29.59	22.90	18.42	25.52	19.55	16.60	21.95
15~59	63.74	69.53	61.68	66.64	71.90	63.57	67.44	71.28	64.32
60+	8.58	8.15	8.73	10.46	9.68	10.92	13.01	12.12	13.73
总计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力,所以老龄化问题突出反映在城镇户籍人口及其微观家庭结构上。而农村的人口老龄化则不仅存在微观家庭结构空间分裂的问题,而且在宏观人口老龄化程度上也早就超过了城镇。图3的人口年龄结构“金字塔”是按城乡各年龄组人口占城乡各自总人口比例绘制的,如果按2005年人口调查公布的城乡人口绝对数来直接绘制,便可以看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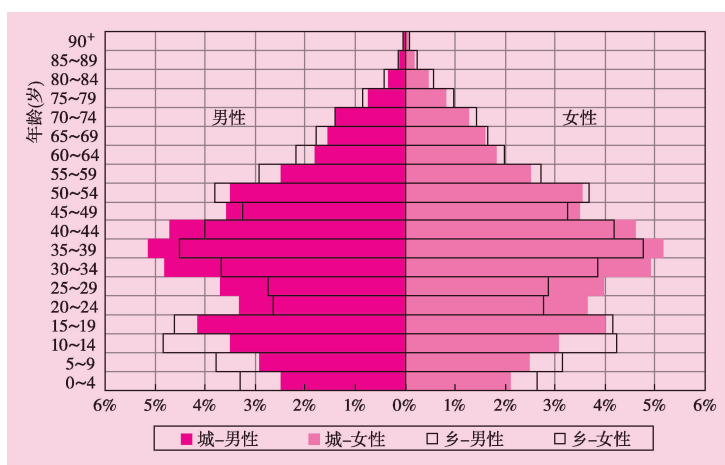


图 3 2005年城乡人口年龄结构的比较

资料来源: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公布数据。

实际上城镇20~34岁的绝对人数已显著超过农村,从而揭示出两个方面的事实:一是全国年轻劳动力分布已偏重于城镇;二是全国处于生育旺盛期的妇女半数以上都已身居城镇。这两者分别对国家经济运行和人口再生产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如果未来的人口城镇化继续这种大规模吸纳农村年轻劳动力的模式,将会使人口老龄化方面的城乡倒挂变得更严重。

少儿人口是未来两种再生产的后备军。从图3可以看出,2005年时城镇15~19岁人口规模较大,是其上一代大规模人口组的“回声”,但在此之下的年龄组则继续大幅度缩减,这就意味着将来城镇要维持比较稳定的经济运行,还需要继续大量从农村吸纳年轻劳动力。然而,农村少儿人口数量在10~19岁的“回声”过后,也同样出现了显著缩减^①,并且到时人口城镇化比例要比近期刚刚经历过的新增劳动力数量缩减时的城镇化比例提高很多,因而更可能出现全面的劳动力供应短缺。所以,从全国人口格局来看,无论是上海还是其他城市,今后已经不可能再像以前那样从外部吸纳大量年轻人口来解决劳动力和老龄化的问题了。

五、小 结

由于上海长期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导致其户籍人口年龄结构十分畸形和脆弱,需要依赖大量年轻力壮的外来人口联合支撑社会经济的正常运行。这种特殊情况促使上海青年择

偶圈突破了户籍限制,出现了与外来人口的紧密互动和大量通婚。同时,上海吸纳的大量外来育龄妇女在上海生育,导致上海常住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略高于户籍人口,实际上有助于缓解上海的人口老龄化,对上海是利大于弊。并且有迹象表明,上海很多“外来媳妇”为了以后顺利取得上海市户口,在生育和避孕节育方面做得甚至比户籍人口还好。然而,上海长期延续极低生育率,导致其无论是户籍人口还是常住人口的少儿人口部分仍在不断缩减,上海市未来仍然要继续依赖外来人口的补充和支持。但是,随着全国人口城镇化发展和城乡生育率过低,上海乃至全国城镇发展所依赖的劳动力源泉正在迅速销蚀,人口安全问题日益突出。

对于全国而言,以往的人口城镇化的年龄选择性过强,反映出城镇“自我发展”的倾向。这种城镇化模式导致农村人口老龄化问题比城市更为严重,从而可能制约“三农”问题的解决。如果进入城市的农村外来人口进入老龄时还因为户口等原因最终不能市民化而退返农村,则会使农村老龄化更为加剧,也会给外来人口带来越来越严重的社会不公正感,同样会影响城市和整个国家的稳定及可持续发展。

大规模的人口城镇化促进了全国社会经济的发展,然而从人口安全的角度看,如果继续维持过低的生育水平及人口城镇化中对外来劳动力“只用不养,用完就甩”的模式都会对全国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构成挑战。上海市人口转变和社会经济发展方面都处在全国领先地位,其人口现状及未来人口前景对全国的发展有示范作用,在全国总体低生育水平,各出生队列的规模相继缩减的情况下,应对人口城镇化模式进行反思与探讨,及时做出应对和改变。

参考文献:

1. 杜鹏(1994):《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 秦海霞(2003):《婚姻与纵向社会流动——上海市民的婚姻观念》,《社会》,第10期。
3. 彭希哲(2008):《超低生育水平的诠释和应对》,《人口研究》,第3期。
4. 王涤、顾宝昌(2005):《从人口学的视角看中国“三农”问题——试论中国农村人口数量变化与社会经济发展的交互影响》,《人口学刊》,第6期。
5. 王桂新(2008):《上海人口规模增长与城市发展持续性》,《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5期。
6. 赵丽丽(2008):《城市女性婚姻移民的社会适应研究——以上海市“外来媳妇”为例》,《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2期。
7. 周海旺(2001):《上海市外来媳妇及其子女的户口政策研究》,《中国人口科学》,第3期。
8. 周皓、李丁(2009):《我国不同省份通婚圈概况及其历史变化——将人口学引入通婚圈的研究》,《开放时代》,第7期。
9. 上海市统计局(2010):《上海统计年鉴(2010)》,中国统计出版社。

(责任编辑:朱 犁)

① 这显然与以往农村大量年轻妇女流入城镇密切相关。